



欧阳志远 著

天富论

资源节约型经济哲理研究

彊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

——《荀子·天论》

 人民出版社

013059570

F062.1

98



欧阳志远 著

天富论

资源节约型经济哲理研究



北航

C1666879

F062.1
98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石笑梦
版式设计:姚 雪
责任校对:张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富论:资源节约型经济哲理研究/欧阳志远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1706-5

I. ①天… II. ①欧… III. ①自然资源-资源利用-研究-中国
IV. ①F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2251 号

天富论:资源节约型经济哲理研究

TIANFULUN ZIYUANJIEYUOXING JINGJI ZHELI YANJIU

欧阳志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66 千字 印张:10.75

ISBN 978-7-01-011706-5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绪 论

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利用水平,资源利用水平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围绕经济转型出现了诸多目标,这些目标有的内涵不清、有的相互叠加、有的包含误导,理论上的混乱使得经济转型的具体工作趑趄而行。上述局面的改变仅靠经济学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借助哲学力量进行全面系统的思想清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大会)”召开之际,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生态产业革命而不是信息产业革命”^[1]。此论一出,褒贬不一。毕竟信息技术影响深远,所以,当“知识经济”风靡国际之后,很快就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其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又从国外接踵而至。当然,后两者毕竟已经切入生态资源观,与“知识经济”不在同一个层次。到底如何概括当代经济的正确走向,笔者2004—2006年连续发表三篇论文,主张独立思考,并且提出了关于建立“节约型经济”的哲学思想,该研究于2007年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偶翻《胡适日记》发现,胡适曾与学友韦莲司谈到东西人士迎拒新思想之不同。他说:“偶语韦女士吾国士夫不拒新思想,因举《天演论》为证。达尔文《物种由来》之出世也,西方之守旧者争驳击之,历半世纪而未衰。及其东来,乃风靡吾国,无有拒力。廿年来,‘天择’、‘兢存’诸名词乃成口头禅语。女士曰:‘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

经几许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2]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之后,在西方引起争议不小,而在中国却风靡不悖,胡适断言中国知识分子不拒绝新思想。但韦莲司却认为这是因为西方人不人云亦云之故,任何新思想都必须经过实验和辩论,方能成为定论。而东方人则习惯盲目崇拜大人物言语,一旦动听,便成圭臬。所以,不轻受新思想,未必是短处;轻受新思想,未必是长处。韦莲司所批“轻受”海外观念之风,到如今仍为国人处事中一大流弊。

2011年2月21日笔者在《光明日报》撰文《别让平庸论文充斥期刊》指出:创新是科学的灵魂,科学必然带有风险,有非议是科学的常态。论文的价值评判要有一定的时间期待,规避非议只能导致平庸。社会要包容各种非议,才能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保护创新性思想露头。^[3]

2011年4月28日《人民日报》评论部撰文《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指出: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无助于社会和谐的建设、健康心态的形成。只有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社会才能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4]

本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节约型经济的哲学基础研究》的最终成果,系突破国内外生态哲学与经济学现有理论的一个尝试。在生态经济的论域中,“资源节约”的目标早已有之,但它总是与“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杂陈,内涵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本成果提出的“节约型经济”与以上几种模型都分别作了界限划分,首次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节约型经济的内涵进行了详尽论述,并对中国节约问

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力图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一个明晰的经济目标,改变经济转型无所适从的局面。成书之前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为先期成果,本成果在原有基础上作了系统深化,提出了一批概念和命题,属于原创性成果。

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积习,是建构节约型经济的一大障碍。本成果虽然希望为民众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提供一些帮助,但探讨尚未特别深入,进一步的研究将把它作为主要方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自己家园的命运就在自己的点滴取舍之中。如果环境保护只是停留在美好词句之上,那么美好环境只能永远离我们而去。

欧阳志远

2012年6月 中国人民大学静园9号楼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财富本体论	(1)
一、虚拟经济深切	(1)
(一)金融危机别观	(1)
(二)“信息社会”复议	(7)
(三)“知识经济”质疑	(12)
二、资源价值探讨	(18)
(一)资源概念演变	(18)
(二)资源价值理解	(24)
(三)财富意义求索	(29)
三、“内在价值”问难	(35)
(一)“内在价值”争论缘起	(35)
(二)“价值”概念历史考证	(41)
(三)“内在价值”现实困惑	(46)
四、“人类中心”审察	(52)
(一)主客关系反思	(52)
(二)“动物权利”争鸣	(58)
(三)人类地位研究	(63)
第二章 节约认识论	(70)
一、节约与发展	(70)
(一)“发展”概念追溯	(70)

(二) 悲观主义回味	(76)
(三) 发展话语检点	(82)
二、节约与循环	(87)
(一) 顺应式开发选择	(87)
(二) “循环型经济”商榷	(93)
(三) 节约型经济设置	(99)
三、节约与文明	(105)
(一) 生态文明定位	(105)
(二) 节约文明透视	(110)
(三) 贫富界限辨析	(116)
四、节约与责任	(122)
(一) 节约型经济定性	(122)
(二) 节约型经济运行	(128)
(三) 节约型经济评判	(134)
第三章 节约方法论	(141)
一、空间性技术层面节约	(141)
(一) 适用性节约	(141)
(二) 替代性节约	(148)
(三) 简构性节约	(153)
二、时间性技术层面节约	(159)
(一) 惜消性节约	(159)
(二) 驻消性节约	(165)
(三) 预防性节约	(171)
三、综合性技术层面节约	(176)
(一) 设计性节约	(176)
(二) 化害性节约	(182)
(三) 组织性节约	(188)

四、综合性社会层面节约	(195)
(一)决策性节约	(195)
(二)制度性节约	(201)
(三)教育性节约	(207)
第四章 中国节约论	(213)
一、发展目标论	(213)
(一)节约障碍论	(213)
(二)改革方向论	(219)
(三)民众行为论	(225)
二、行为变革论	(231)
(一)小节大节论	(231)
(二)行为坐标论	(236)
(三)人格重塑论	(242)
三、理想求索论	(248)
(一)传统理想论	(248)
(二)理想比较论	(254)
(三)理想教育论	(260)
四、经济责任论	(266)
(一)责任经济实质论	(266)
(二)责任经济建构论	(272)
(三)责任经济催化论	(278)
注 释	(285)
参考文献	(310)
附 录	(312)
人名索引	(314)
主题索引	(324)
后 记	(329)

第一章 财富本体论

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利用水平。金融危机的本质在于,对自然资源的透支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而造成生态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双重破坏,两种危机完全相通。虚拟经济的要害在于掩盖了自然资源的价值,现代社会要使资源价值保持和恢复,必须投入人类劳动,资源价值和劳动价值正在走向统一。从本体论看,所谓财富首先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信息负载实体,“信息财富”论及其派生的“知识经济”论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无法成立。“内在价值”论则从另一个极端走进了误区,其要害在于把事物的固有性质降低为对他物的意义,结果反而削弱了事物性质的先在性和恒定性。“内在价值”实际上还是“价值”,与之联系的“动物权利”,宜改为“动物善待”。关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应当放弃有特定含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代之以“人的类存在主义”。“类存在”是在其他物种不致灭绝前提下的存在,实质是以创造性的负责任态度开发自然。

一、虚拟经济深切

(一)金融危机别观

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似乎突如其来地席卷全球,数年之后这场灾难的阴霾仍然笼罩在全球上空。金融危机的本质并不是货币的亏空,而是隐藏在货币亏空背后的自然资源透支。自

自然界是完全不依赖人类的,而人类却必须依赖自然界。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加剧自然资源的非理性消耗,那么人类即使有再多的金融符号,也免不了陷入灭顶之灾。金融危机发生后,就连西方学者也批评道:面对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却在转移视线、宣扬气候变化的威胁,力图掩盖一场即将掠走人们住房和储蓄的大洪水。不管西方世界头面人物的意图如何,从根本上看,其言论倒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们不能够或不愿意点破:化解金融危机的根本在于驱除经济领域的符号迷雾,还原社会财富的本来面目。

2011年,T. 伊格尔顿(Eagleton, T.)推出了一本带有轰动性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其中说:“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有幸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2008年陷入全面危机,甚至连商业街上的自动提款机都险些面临关闭的命运。”“传统左翼党派的口号‘进入社会主义,还是退回野蛮社会’,如今看来不再是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而是振聋发聩的警世箴言。在这样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必将重现人间’。”“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1]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也颇具澄清视听的借鉴意义。

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的共识是:“和平”与“发展”为世界的两大主题。30年过去,“和平”虽屡遭破坏,而“发展”却从未消泯。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为资源的利用水平。当资源利用主要是以量的扩展方式推进时,无论是恐怖活动还是国家冲突,背后都可以看到自然资源争夺的影子。热点地区的冲突,完全就直接围绕着资源争夺来进行。就发展本身来看,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发展

的两大威胁,但除了严重的公害事件以外,人们一般都看重前者而轻视后者,实际上两者是完全相通的。要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就必须研究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凯恩斯主义”来调控国家经济生活,J. M. 凯恩斯 (Keynes, J. M.) 认为,现实否定了微观经济理论中的论断:价格、工资和利息的自动调整会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他主张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并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政府的干预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矛盾和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解,从而使经济进入了一个扩张时期,但是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这一体制发生了严重动摇:一方面,石油危机使得经济增速放缓,通胀问题日益突出,支撑福利国家的财力基础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精英人物认为,把社会各阶层纳入受益者范围的民主政治体制,无法作出伴随着“痛苦”的决策,从而导致决策系统陷入了功能性障碍。

1979 年英国 M. H. 撒切尔 (Thatcher, M. H.) 政府上台和 1980 年 R. W. 里根 (Reagan, R. W.) 在美国主政后,英美国家改为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即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来治理国家,同时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大量实体制造业转到国外,而把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于是经济便逐步走向虚拟。虚拟经济是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的经济,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通过虚拟资本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渗透来推动实体经济运转。虚拟经济确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功能,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早就有人警告过,它的盲目发展会严重危害社会。

虚拟经济产生于信用制度。K. 马克思 (Marx, K.) 指出: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 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 他人的财产, 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 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在这里, 一切尺度, 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 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2]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充满矛盾, 它是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同时又使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更趋尖锐, 投机和欺诈活动大规模蔓延开来。

金融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下半叶, 金融炒作自兹开始。但当时金融业立足的根基还是为制造业融资, 至多参与制造业的经营管理, 通过投资获利, 它与制造业的关系是紧密捆绑的。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之处在于, 这次危机不是直接生产过剩引发的危机, 而是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一方面反映了信息技术产生的社会功能, 同时也迎合了西方国家逐渐滋长的寄生心理。从美国开始金融业逐渐变异, 到 90 年代达到高峰, 出现了“金融工学”, 通过设计各种模型进行金融投机, 直接用货币套取货币。少数人借助美国一家独大的国际地位, 轻松地劫持了全球经济, 国家的开支也越来越依赖于从世界各地吸引的资金, 所以美国极力巩固其国际强权, 其基本措施一是开发关键技术以保持军事威慑, 二是主导游戏规则以维护美元本位, 三是实施人权战略以驾驭文化格局。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峣峣者易缺, 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 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3] 当金融占据社会中心之后, 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三:

第一, 经济虚化使得国内就业岗位大量削减, 造成依靠社会

救济的对象猛增,而金融业却拿着远远超过任何行业的收入。虽然它可以凭借国际地位“外掠内补”,但只要与实体经济背离就注定会出风险。不过金融风险很容易就通过政府向全社会转嫁,以致“全社会为少数人的奢华付费”这种格局成为常态。由金融业的力量所决定,政府对挖补机制的改变一直力不从心。不能低估西方资本主义的调控能力,更不能轻言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但也不能断言不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治畸变。有人甚至担心会像当年魏玛共和国那样,诞生“微笑法西斯主义”。

第二,金融投机带来的暴富效应进一步击垮了资本主义早期勤奋节欲的新教观念,不劳而获的心理像病毒一样在西方社会急剧蔓延。巨大的利益反差把社会的聪明才智大量引向金融领域,理科研究和实体产业受到严重挤压。在西方现行政治机制中,头面人物为了竞选获胜,往往提出不切实际的福利许诺,沉重的财政负担造成债务危机。欧美国家都在以智能技术力挽制造业颓势,然而无论实体产业的自动化多高,终不如巧取豪夺的诱惑力量强大。当“冷战”胜利带来的天国依赖成为荣耀之后,要到尘世间去跌价挣面包吃,可能是一种屈辱。

第三,金融投机获取资金容易,一旦得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就会毫不吝惜。所以无论是操纵者还是被操纵者,都深陷狂热消费的旋涡,拼命追逐最多的财富和最新的乐趣。这种价值观念不仅主宰了西方,而且引领了世界。金融危机可能会在一些国家暂时抑制过度消费行为,但不可能去除过度消费动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化解金融危机的方向所指,是没有尽头的欲望刺激,最后结果是一轮深过一轮的恶性循环。这种态势对于生态意识的培养带有灭绝性质,它会使国际社会千辛万苦拯救地球的努力付之东流。

人们往往把酿成资本主义债务危机的福利主义祸根,说成是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结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社会主

义当然应该为人民谋求福利,其中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尽力关照,但这种福利是通过共同劳动来获取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劳动是人猿区分的根本界限,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核,是要让劳动者通过有尊严的劳动来获取应得的报酬并实现社会价值,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所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为“劳动党”,不管它们后来是否成功,但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这样认识。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马来西亚前总理B. M. 马哈蒂尔(Mahathir, B. M.)说过:“我们之所以发现整个世界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就是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以牺牲他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4]后来欧洲债务危机发生,马哈蒂尔又发表文章指出:在美国反恐战争伊始,布什总统就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归类为“失败国家”。现在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失败了,但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失败了。印制钞票和填写支票毫无帮助,他们必须放弃高福利,停止金融赌博,拿更低的工资去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

2012年1月在巴西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把“资本主义、社会公正和环境危机”作为主题。与会知名学者一致认为,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已经威胁到了人权。有学者指出,欧洲的民主和宪法都不合格,现在主宰它们的是高盛公司。有理由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最生气勃勃的中国就鄙视西方那样的民主。还有学者指出,各种资源都是有限的,而金融行业却造成了市场的贪婪无度,所以环境危机、食物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相互关联,错综交织。这是迄今国际社会关于金融危机的最深刻见解。

尽管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做了大量肯定,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问题:第一,劳动力素质不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第二,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完善,否则阻碍经济增长方

式转型;第三,西方经济衰退牵动全球,中国经济难免受到殃及。资本主义确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已经引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也必然面临艰难抉择,毕竟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是共同的,不能忽视金融投机心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影响。中国的优势在于宏观调控机制,但这个机制正在受到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瓦解和冲击。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史证明,时局越是混沌,社会对理论的期待越是强烈。不少人认为,就问题发生的直接部位来看,有必要改进互联网的功能,以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这种认识显然还停留在表面,实际上互联网只是一种技术,技术是由哲学思想操控的,如果价值观念得不到转变,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从深度分析,危机的发生与“信息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可以说,这次危机是对“信息社会”理论的又一次重创。虽然问题出在经济学领域,但事实证明传统经济学解决问题只能就事论事,不愿意也不可能深究问题的全部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要釜底抽薪还得借助哲学。自然辩证法作为哲学与现实的桥梁,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 G. W. F. 黑格尔(Hegel, G. W. F.)所说,柏拉图(Plato)不必教乳母如何护理婴儿,J. G. 费希特(Fichte, J. G.)不必教警察如何改进护照,重点在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观念透视和方法引领。

(二)“信息社会”复议

1992年,笔者在博士论文《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当中,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用信息社会来概括后工业化时代,是一个理论错误,主张用“生态产业社会”取代“信息社会”,提出了“采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产业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四阶段论。“生态产业社会”理论引起了相当的社会反响,但基于西方话语权的强

势,“信息社会”理论还是风行不悖并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看来,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必要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再认识。

信息社会理论最早表现为“后工业社会”理论,1973年,D. 贝尔(Bell, D.)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概念。他认为,继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后,人类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体现是:(1)在经济上,由制造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2)在职业上,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在职业分布中居于主导地位;(3)在社会轴心上,理论知识取代经验知识成为社会革新和政策制定的源泉;(4)在未来方向上,控制技术发展和对技术进行鉴定;(5)在决策制定上,创造新的“智能技术”。^[5]

1980年,J. J. 塞尔旺-施赖贝尔(Servan-Schreiber, J. J.)在《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中提出: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世界正面临着“非工业化”即“信息化”的前景,信息社会必将取代工业社会,犹如工业社会之于农业社会一样。^[6]1982年,J. 奈斯比特(Naisbitt, J.)在《大趋势》一书中阐述了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1)工业社会的战略资源是资本,信息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2)工业社会的“劳动价值论”,被信息社会的“知识价值论”取代;(3)农业社会关注过去,工业社会关注现在,信息社会关注将来;(4)农业社会里的竞争和对抗存在于人与大自然之间,工业社会里的竞争和对抗存在于人与人造的大自然之间,信息社会里的竞争和对抗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之间。^[7]于是形成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

围绕“信息社会”所展开的问题,属于社会形态问题。关于社会形态,通常是根据生产关系来确定的。按照生产关系标准,可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所得到